

近五年《隋书·经籍志》研究综述

罗朝香

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近五年对《隋书·经籍志》的研究按照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隋书·经籍志》微观考辨；二是《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研究；三是《隋书·经籍志》文学思想研究。其中不乏有许多有创见的文章，如王云鹏对“总集”的再阐释；阳清、何雪利对重出文献及其重出原因地再考辨；赵建军从文学的角度关照《隋书·经籍志》，开辟研究新途径等，但是重复研究的问题依然存在。

[关键词]《隋书·经籍志》；文学思想；比较研究；微观考辨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1941

前言：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著作，且是目前现存的最早以经、史、子、集为部类名称的史志目录，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研究的成果数不胜数。唐荣撰写了《近十年〈隋书·经籍志〉研究综述》一文对2006年至2016年的《隋书·经籍志》研究进行了综述，让我们对那十年的《隋书·经籍志》的研究状况有了清晰的认识。本文接续前辈，对近五年的学界对《隋书·经籍志》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

一、《隋书·经籍志》微观考辨

内容主要包括对“总集”的重新界定，对重出文献的定义的解读以及探究重出原因，对“以经史子集”为部类名称始于《隋书·经籍志》的观点进行辩证。主要都是针对前人的观点进行再考辨。

马楠对《隋书·经籍志》在编纂过程中所依据的书目进行了考证并得出结论：一是《隋书·经籍志》是“五代史志”之一，修纂过程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贞观初年点对“见存”，在《经籍志》中可见若干条证据；二是《七录》在分类体系、著录形式等方面影响《隋书·经籍志》，如处士征召不就，南北朝书目旧式著录衔名称“某官征不就/起/拜”；三是写本文献中多有“细字”书写，没纸容字约为一般书写四倍左右，据此推论《隋志》著录中当有“细字”文献。

王云鹏对许云和先生在《经典建构〈隋书·经籍志〉总集的范式意义》一文中提到的“当时为总集编撰所定立的原则和标准就自然是‘选’而不是‘总’，这就意味着现代总集概念中最重要元素——集多人之作并不是那时总集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不强求集多人之作为总集之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只要个人著作和作为书部的单篇作品具备了‘选’的特征，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总集。《隋志》总集就是按照这一观念来著录个人著作和单篇作品的”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张剑华的观点和许云和先生同）一些集众家文章而不进行甄选的总集，例如谢灵运采用“逢诗辄取”的方法，编纂了七部总集，即是驳许云和先生“把这些杂文视为总集，认为其具备‘选’的特征”的观点的明证。指出《隋书·经籍志》体例大体因循《七录》而鲜有变革，《七录》文集分为四部：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而《隋志》只设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楚辞类没有杂文，别集类亦没有杂文，剩下“总集”一类便是杂文附入的部类了。

《隋志》总集的部类称谓是依据学术范畴设立的，而不是依据文体形式命名的，总集有林林总总的宽泛含义，楚辞类、别集类以外的文学文献都属于总积累著录的范畴，因此《隋志》总集类包含杂文，而不必单独设置“杂文”一类。《隋志》总集类主要收录楚辞类、别集类以外的文学文献，既包

括《隋志·序》中界定的狭隘层面的总集，也包含杂文及其他体式的文学文献。

孙振田对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经籍志·序》其中两个问题进行了考校，指出谢灵运、王亮、谢朓、任昉、殷钧等之“《四部目录》”、王俭之“《目录》”，包括梁有之“《五部目录》”，其书名号均当去除。《隋志序》相关叙述重在交代目录著作的部类变化，“四部目录”“五部目录”意指将书籍分为四部或五部的目录，而非目录著作的称名。加上书名号，掩盖了《隋志序》原本叙述目录部类划分的主观意图，使其目录学史料的价值大打折扣。该版《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的最后“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中的“《史记》”“史记”应为“史之所记”之意，不单指司马迁之《史记》，其书名号亦当去除为是。

何雪利对《隋书·经籍志》著录重出文献的原因进行了探究，认为前学者仅罗列《隋书·经籍志》重出文献，且不全面，对于重出的缘由亦未探寻。整理出了重出文献条目，并指出重出文献原因有三：《隋书·经籍志》撰者非一人、文献分类不明、失于校勘，其中失于校勘又细分为亡而亡、篇名不同、单行本与合本同行、同书不同卷、名与字皆行五种不同的情况。

阳清、何雪利对《隋书·经籍志》的重出文献进行了研究，将文献重出的含义界定为特指某种典籍重复出现目录学著作之中。认为古代学者针对《隋书·经籍志》文献重出现象的举例和分析，不免流于宽泛。适当考虑典籍称名特别是严格要求卷数和撰者相同，应是判断《隋书·经籍志》文献重出的前提条件。《隋书·经籍志》著录重出文献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亦即同一种文献再两种类别中出现、同一种文献再同一类别中两出。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文献本身在形制和内涵方面的双重性、交叉性以及复杂性，以致撰者在文献归类时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归因于撰者并未检读原典，而是直接综合前代目录学的成果，甚至在文献归类后没有进行严格校勘。此外，撰人众多导致责任不明和体例不一，事后未经有效统改和严谨处理，同样容易出现重出和淆杂之弊。

二、比较研究

（一）《隋书·经籍志》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研究

燕思睿认识到《隋书·经籍志》和《汉书·艺文志》相比，《隋书·经籍志》将《孝经》的位置提到了《论语》之前。而史志书目的编纂极为严苛，可谓字斟句酌、一字千金，故《孝经》的次序变化绝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并对孝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孝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国君具备孝的品质，国家便会和谐昌盛；而对个人而言，尽孝分三步走，首先要爱惜父母给予自己的身体，侍奉亲人，其次要侍奉自己的国君，奉献于国家，第三

要立身行道，以建功立业来使父母显赫。孝经将天下之人分为五个阶层，阐述了每个阶层应尽的义务。孝不仅仅是赡养父母，而是最低的要求，所谓阶级越高，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身上所背负的“孝责任”就不是私德，而变成社会公德，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变成了孝的终极目标。《孝经》在唐代崛起源于其政治功能。李渊立国后，李世民手刃兄弟，逼父退位。而李世民儿子同样想走父亲的老路，想杀掉深得李世民信任的李泰，而后逼宫。所以李世民不得不立“忠孝仁爱”的李治为太子。李治规定《道德经》和《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需兼通”，并下诏制定了“唐朝界定不孝行为最全法律”《唐律疏议》。《隋书·艺文志》的编纂者魏徵参与了《贞观律》的修订，而《唐律疏议》就是在《贞观律》的基础上修订而来。魏徵自小失去双亲，但其将“孝”发扬为“尽忠重德”。所以《孝经》的次序的提前是唐代君王重视孝道及《隋书·经籍志》编纂者的主观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

顾一凡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地理书著录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汉书·艺文志》中与地理有关的书目主要涉及兵书地形、五行形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中的地理书逐渐演变独立，划分为史部中的地理类。并对地理类书籍的演变及数量增多的原因进行了揭示：魏晋时期，“求异志怪”的地理观与宗教特色的生活方式引发了对地理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南北朝时期，“求真竞美”的创作观念促进了地理书的撰写；隋朝时期，“上计”资料搜集制度帮助了地理书的创作与编纂。

吴丹阳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小说部进行比较，指出《隋志》小说著录与《汉书·艺文志》相比，创作主体由“稗官”“道听途说者”“闾里小知者”变为（相当一部分）王公贵族或者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学者。在选取小说的内容方面，认为《笑林》《世说》是最为典型的两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文人士族日常生活，且比其他文学形式如诗、赋等更为直观通俗。作者认为《隋志》在所录小说创作主体社会地位的选择和内容的选取上都为小说争取了更高的文学地位，推动了其后唐传奇的发展。

伍微微也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小说类序及小说类著录书籍进行分析，指出《隋书·经籍志》当中著录书籍增加，种类增多；著录方式不同，关注点也有差异；且对小说家的认识不同。班固认为小说是“实录”，能补史之阙；而《隋书·经籍志》将魏晋时期的搜奇记异的志人志怪作品都归为史部，显然是承续了班固的小说观。而叙事学上的小说观强调“虚构”。这就显示出古典目录学上的小说观念与叙事学上的小说观念的差异。

除了上述文章以外，还有彭研《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到〈隋书·经籍志〉“集部”看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魏俊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与〈隋书·经籍志〉“经部”比较研究》，都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进行了比较研究。

（二）《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研究

徐颖颖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春秋类目录进行了分析，指出春秋类在目录学发展中，经历了六艺略到经部，及部分入史部的演变，这一演变不仅体现了经学在中国学术思想上的地位，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活跃状况。

除此之外还有孙锐锐《〈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

〉集部比较》一文，对集部进行了比较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隋书·经籍志》文学思想研究

曹东栋对《隋书·经籍志》的集部进行了文学思想研究，指出《隋志·集部·大序》先论述了从汉至隋的文体分类和社会功用，揭示了各个时期的文学特点，评价了历代文学风格的嬗变，表达了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并重的美学思想。《隋志·集部·小序》表明楚辞地位的提高，别集重视心灵蕴含，总集注重文学批评。总之，《隋志·集部·序》反映了从汉到隋，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中摆脱出来，有了独立的审美意识，文学作品的创作数量增多，文体的界限明晰，文学的观念明确，文学批评兴盛，体现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

赵建军教授从文学的角度关照《经籍志》，开辟了一条研究《经籍志》的有效途径。指出《隋书·经籍志》表明了三条重要的文学思想：一是文学的本体特征是言志抒情，且更可贵的是《经籍志》还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情思特质是与作者的人格相联系的，而屈原是《隋书·经籍志·楚辞类》高度礼赞的人物，认为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作家气质、心灵不同，是作品殊相的根本原因。二是强调文学与政治教化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政治状况的好坏决定了诗歌内容、功能有“诵美”“讥恶”之分，如周代的列祖列宗是儒家的政治楷模，则“诵美盛德”成为诗歌的必要功能；“幽厉板荡，怨刺并兴”，政治的退化沉沦又导致诗歌成为“怨刺”的武器。但《诗经》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隋书·经籍志》片面刻意地强调突出了其与政治的关系。三是标举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审美理想。其积极肯定了战国至西晋和“宋、齐之世，下逮梁出”的文学，因为形式与内容兼备；对东晋、梁、陈和北朝的文学进行了批判，因为其形式内容不能兼具。两晋以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片面追求形式的华美，缺乏深厚的感情力量的浮靡文风一直延续到唐初。而《隋书·经籍志》的文学思想为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引领了方向，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结语：

近五年来对《隋书·经籍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隋书·经籍志》的微观考辨，以及和《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研究，《隋书·经籍志》中文学思想研究。其中不乏颇有创见的文章，比如王云鹏对总集的定义的重新界定，阳清、何雪利对重出文献的重新定义以及对重出原因的分析，赵建军对《隋书·经籍志》中文学思想的挖掘。但如前辈唐荣所说，重复研究、表面研究的问题依然存在，这样将不利于《隋书·经籍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参考文献：

- [1] 燕思睿. 论《隋书·经籍志》经部中《孝经》的次序变化[J]. 皖西学院学报, 2021, 37(03): 95-99.
- [2] 孔锐锐. 《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比较[J]. 文教资料, 2021(09): 29-31.
- [3] 曹冬栋. 《隋书·经籍志·集部·序》文学思想研究[J]. 现代交际, 2021(04): 79-81.
- [4] 王云鹏. 也谈《隋书·经籍志》总集的模式——从古典目录学的视域考察[J]. 文学遗产, 2020(06): 186-187.
- [5] 魏徵. 《隋书·经籍志》[J]. 安徽史学, 2020(06): 1.
- [6] 巫宁. 从《隋书·经籍志》管窥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的发展[J]. 青年文学家, 2020(21): 115-116.